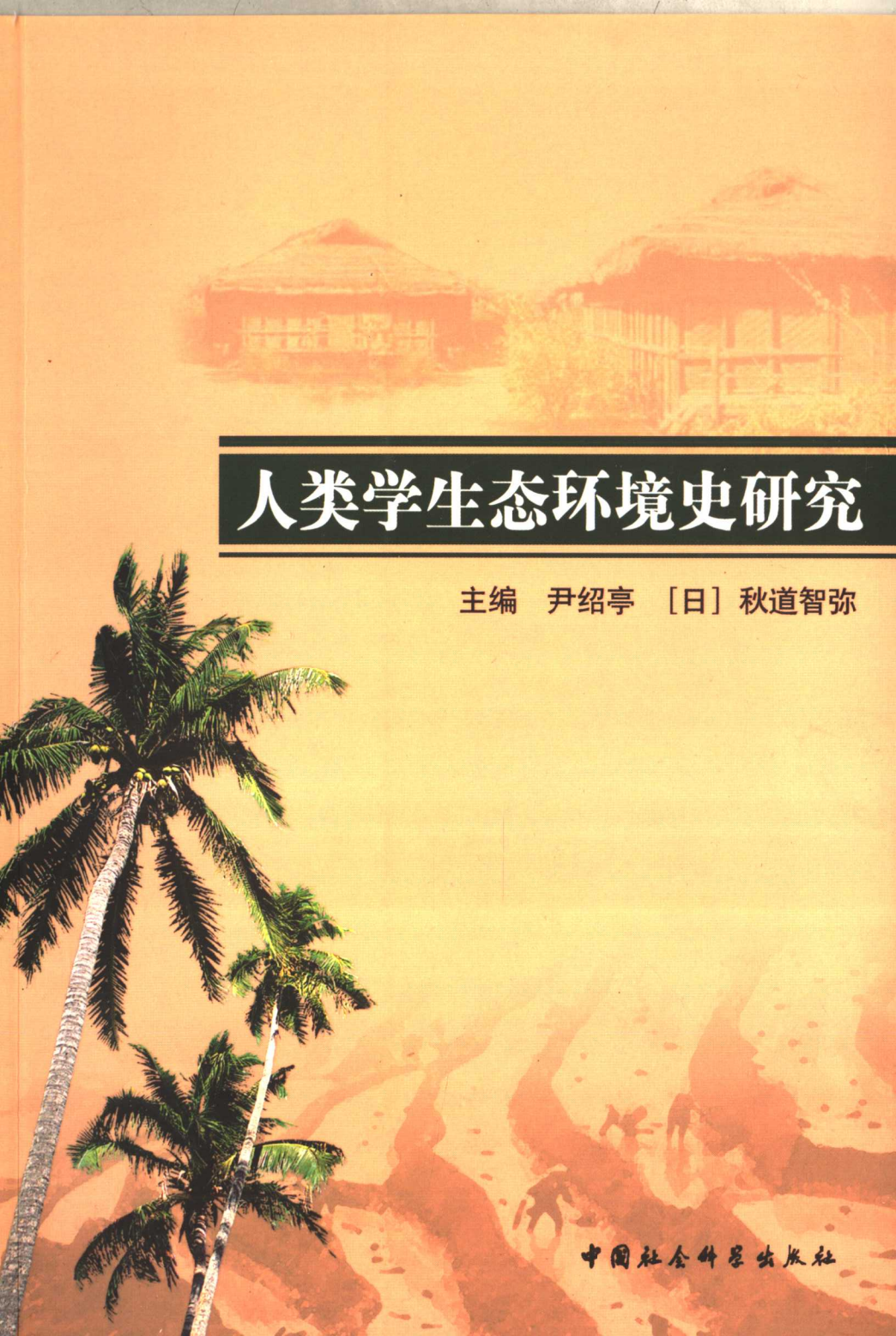




人类学生态环境史研究

主编 尹绍亭 [日] 秋道智弥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金沙江

澜沧江

怒江

人类学生态环境史研究

主编 尹绍亭 [日] 秋道智弥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人类学生态环境史研究/尹绍亭, [日] 秋道智弥
主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3
ISBN 7-5004-5488-0

I. 人… II. ①尹…②秋… III. ①民族
文化—文化史—云南省—文集②生产方式—影响—生态
环境—云南省—文集 IV. ①K280.74-53②X171.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20179 号

责任编辑 李 是
责任校对 修广平
封面设计 三未妨
版式设计 木 子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一二零一印刷厂

版 次 2006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18.875

插 页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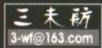
字 数 489 千字

印 数 1—2000

定 价 4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责任编辑：李 是

封面设计：

人类学生态环境史研究初探 (代序)

尹绍亭

2002 年春天,日本综合地球环境研究所与中国云南大学达成协议,共同开展“云南热带季风区生态环境史研究”课题。此课题为日本综合地球环境研究所生态人类学学者秋道智弥教授主持的日本文部省重大科研项目“亚洲热带季风区生态环境史研究”项目的一部分。该项目研究地域包括日本、越南、柬埔寨、老挝、泰国和中国云南。秋道智弥教授在日、越、柬、老、泰四国组织的研究团队,是以自然科学为主的跨学科团队;而在云南,则是由我组织的以中国本土人类学者和民族学者为主的跨学科团队,其成员多达 20 余人;此外,云南的研究还有由阿部健一教授负责的一个日本研究小组。三年来,中国方面课题组成员分别在云南省西南部与越、老、泰、缅四国邻近的地带作了较长时间的定点田野调查,迄今为止,写出论文 20 余篇。本文集收入了 18 篇论文,即选自这批成果。作为云南生态环境史研究的初步成果,当其出版之际,有必要对它的理论、方法和学术意义作一个简略的评介。

人类学生态环境史研究的理论

通常认为,生态环境史是研究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

及其互动演变过程的学科。由于迄今为止我们所认识的人类与自然环境的互动演变过程主要是历史的事象,是人类历史的组成部分,因而生态环境史属于历史学的范畴,被视为历史学的分支学科。正因为如此,所以无论国内还是国外,从事环境史研究的学者大都是历史学者。因而,虽说生态环境史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才产生的新兴学科,而国内外史学者其实早已涉足其间。就中国而言,“环境史”这一学科名称的出现不过是最近20年的事情,但它所研究的对象对于中国史学界,尤其是历史地理学界而言却并不陌生,他们在这方面的耕耘和积累早已为学界所瞩目。从历史学和地理学的结合到历史学和生态学的结合,应该说是一个飞跃,其意义不可低估。

“环境史”(the Environmental History)一词最早由美国学者纳什在《美国环境史:一个新的教学领域》(R. Nash: *Americ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A New Teaching Frontier*)一书中提出,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美国兴起并得到长足发展。^①关于环境史的研究对象和定义,纳什主张这门学科是研究“历史上人类和他的全部栖息地的联系”。另一位美国学者克罗农(William Cronon)把环境史等同于生态史,他认为环境史“将历史的界限延伸到人类制度以外的自然生态系统,经济、阶级和性别系统,政治组织、文化仪式均在自然生态系统中活动”。而环境史学者沃斯特(Donald Worster)则认为:环境史是“研究自然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②。澳大利亚学者伊懋可给环境史下的定义是:“环境史不是关于人类个人,而是关于社会和物种,包括我们自己和其他物种,从他们与周遭世界之关系来看生和死的故事。”^③而他认为更精确的定义则是

① 高国荣:《环境史学在美国的兴起及其早期发展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未刊稿),2005年,第4页。

② 同上。

③ 刘翠溶、伊懋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95年,第1页。

“透过历史时间来研究特定的人类系统与其他自然系统之间的界面”^①。从以上所举几位学者对环境史所作的定义可知，虽然每个人的表述方式有所不同，然而把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史或者说人类系统与自然系统的关系史作为环境史的研究对象，这一点看来是大家所认同的。

生态环境史属于历史学范畴，然而“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又非史学研究的“专利”，乃是与诸多学科相关联的公共研究领域。众所周知，地理学是最早注意人类与自然环境关系的学科。晚于地理学产生的生态学，不用说也以此为研究对象，而且能够更为科学和精确地对其进行分析。人类学和生态学一样，至今有 100 多年的历史，它分为体质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和文化人类学四个分支。体质人类学研究人类的起源、进化及遗传差异；考古学根据人类的物质遗存研究人类的历史和文化；语言学研究语言的多样性和文化的关系；文化人类学研究不同的族群及其文化。总之，人类学就是研究人类的一门综合的学问。然而无论是研究远古的人类进化还是研究现代的族群差异，不论是研究生物属性的人类还是研究社会文化属性的人类，都不可能脱离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都不可能忽视生态环境所给予人类的重大影响。因此，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亦是人类学不可或缺的一个永恒的研究主题。

如前所述，人类学中的文化人类学是研究族群及其文化的学问。地球上为什么会存在那么多不同的族群，为什么会有那么丰富的文化多样性？这是人类学家一直致力研究的问题。在人类学史上，曾产生过许多解释族群及其文化差异和文化变迁的理论，其中就有从自然环境的角度进行解释的学说。例如早在人类学的萌芽时期，便产生过以自然环境差异解释人种及社会文化发展差异的所谓

^① 刘翠溶、伊懋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95 年，第 8 页。

“地理环境决定论”。而当环境决定论暴露出其难以自圆其说的缺陷而遭到种种质疑之后,又出现过所谓“较弱”的环境决定论或称可能论。可能论不认为文化产生的根源在于自然环境,不过却仍然强调自然环境对于文化的某种程度的“决定”作用,即认为自然环境是文化发展水平的严格限制因素。20世纪二三十年代,威斯勒(Wissler)和克鲁伯(Kroeber)等在可能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文化区”的概念。“文化区”是基于地理分布的文化研究,“文化区”与环境决定论的不同,在于它并不从自然环境的角度去探求文化的生成及其发展差异的根源,而是着眼于特殊地域所对应的特殊文化形态。当然,地域文化所显示的具有特殊形态的文化与环境的对应关系,无疑一定程度地表现了自然环境对于文化的“塑造”或“模化”。由于地理学乃是孕育和产生人类学的“母体”,因而人类学在很长时间内带有人类地理学或人文地理学的色彩那是不足为奇的。然而,传统地理学取向的文化解释,大多仅停留于文化空间分布的分析这样比较表象的考察,因而其考察的对象主要是生计及其技术的层面。而对于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侧面,地理学角度的解释一般采取回避的态度,这也正是它的局限之所在。

弱化地理学的观点,吸收和应用生态学的观点,是人类学人与自然关系研究的一个划时代的崭新阶段。生态学的观点取代地理学的观点,不仅使这方面的研究摆脱了困境,而且使之成为今日人类学研究的最流行的方法之一。^①早在20世纪20年代,生态学的观点就被斯图尔德(Julian H. Steward)引入到他所开创的文化生态学的方法之中。斯图尔德认为生态学的“适应”这个核心概念有助于对文化行为的解释,并且认为文化变迁与适应是一个相互影响的互动过程。适应概念的应用,不仅能够较科学地说明人类在自然

^① 唐纳德·L. 哈迪斯蒂著,郭凡、邹和译:《生态人类学》,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第15页。

界“食物网”中的位置即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而且能够解释环境决定论和可能论所提出而又说不清楚的环境对人类及其文化的所谓“决定”和“模化”的真正意义。文化生态学新颖的视野导致了人类生态研究的迅速进展，至20世纪60年代，又催生出“生态人类学”这个新的理论流派。生态人类学继承文化生态学立足于“适应”的分析方法，并在两个方面大大拓展了适应的研究。第一方面，厘清了人类适应的三个层面，那就是生理层面、遗传层面和文化层面。三个层面完整地观照了人类的生物属性和社会文化属性。然而许多研究事例却又告诉我们，对应于生态环境，哪怕是非常特殊的生态环境，人类的生理和遗传这两个层面的适应均不如想象的那么丰富，而最为丰富和复杂的适应却是文化的适应，这也就是生态人类学研究的魅力之所在。第二方面，深化了文化适应的层面。文化生态学一般只关心生计和技术适应的层面，生态人类学同样重视这个层面，但不仅停留于此。在此基础上它进一步把分析的触角延伸到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适应的深层中去。技术、制度、精神三个文化层面适应的整合，使得人类学的生态研究具备了独特和更为有效的文化解释功能。

生态及其适应观点的流行，促使人类学跨入到生态学的领域，从而使人类学获得了崭新的视野并拓展了其研究的空间。另一方面，不少自然科学者也一改传统的“见物不见人”的思维定式，把目光投向了与“物”关系极为密切的人类及其文化。他们凭借其植物学和生态学等专业知识，兼取人类学文化相对论的观点和主位研究的方法，亦创出了独特新颖的跨学科的研究途径。主要由植物学家和生态学家开拓的民族生态学，是一门由植物学、民族植物学、文化生态学和认知人类学整合而成的学科。民族生态学以土著族群的传统知识为研究对象。对于植物、动物、土地、时间、空间等自然资源和环境的分类和利用，亦即他们对于周围世界的认知和行为，是其传统知识的集中表现。进行土著族群的认知体系和行为

体系的研究,无疑是一条可以深入理解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有效途径。生态系统是生态学的重要概念,是现代生态学研究的主要对象。生态系统是指在一定空间中共同栖居的所有生物与其环境之间由于不断进行物质循环和能量转换过程而形成的统一整体。^①为了使人类学的生态研究充分吸纳和体现生态学的学理,一些人类学学者不仅尝试运用生态系统对不同族群与环境的关系进行有机整合的研究,而且努力尝试用定量的方法分析系统之中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并试图建立能够反映系统的功能和机制的模型。这样的研究虽然还面临不小的困难,然而其探索毕竟是十分有益的。

通过以上简略的理论回顾可知,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乃是一直伴随人类学产生和发展过程的一个无法忽视的课题,无论是地理学的角度还是生态学的视野,人类学者始终致力于人类及其文化与自然环境相互关系的解释,并且创建了文化生态学、生态人类学、民族生态学、人类生态系统等诸多理论流派。应用这些理论研究人类与自然环境的互动过程,这就是人类学生态环境史研究的角度和特色。

云南生态环境史研究的初步成果

如上所述,人类学生态环境史研究有其独特的视角,其理论取向与历史学生态环境史的研究是有所区别的。不仅如此,在研究方法上也相去甚远。要而言之,两者的不同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其一,由学科的性质所决定,历史学主要根据文献资料进行研究,而人类学则主要靠田野资料进行研究。诚然,国内外也不乏从事田野调查的历史学者,然而通常历史学的调查与人类学的调查无论在目的、角度还是在方法、手段等方面均有很大的差异。其二,历史学

① 李博主编:《生态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97页。

利用文献资料可以构筑宏大时空的生态环境史，而人类学依靠田野调查研究的结果，则往往是较短时期和较小空间的比较精细的作品。其三，由于主要采用田野调查方法，因而无文字的族群、现代和当代无文字记录的地区以及许多非文字自然文化遗产的生态环境史，便成为人类学研究的主要对象。

本文集的大部分论文，便体现了上述几个特点，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部分的内容。第一部分是关于水文化和水资源及其变迁的研究，有两篇文章。水作为人类生存最重要的资源之一，由于工业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人口剧增的原因，其严重短缺和污染的状况已成为当代社会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近年来，许多学者投身于水资源和水文化的研究，其动向和成果备受学界的注目。2005年9月，国际水历史学会在昆明举行第三届国际大会，会议的主题即为“水文化与水环境保护”。本文集收入的两篇有关水的文章分别是郭家骥的《西双版纳傣族水文化的变迁与可持续发展——景洪市勐罕镇曼远村案例研究》和郑寒的《大坝与社区：环境变迁中的资源利用与管理——澜沧江流域漫湾镇慢旧村的调查研究》。前一篇文章研究傣族的水文化及其变迁，是从生态人类学角度切入的生态环境史论文。作者对傣族传统水文化的梳理以及对变迁因果的分析，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一篇文章研究漫湾镇资源利用管理的变迁，漫湾因成为澜沧江建电站筑大坝的地点而成为国际关注的热点。对于大坝建设是否影响和破坏环境以及是否损害“当地人”权益的这一“敏感”的话题，人类学的贡献在于可以凭借其全面、翔实的田野资料 and 不同视角的整体的综合分析，给人们提供一个理性认识的参照，从而减少感情色彩的偏见和空泛的争论。而对于大坝建设前后资源利用管理状况的对比，时段虽短，但却是典型的生态环境史事象。

第二部分是关于文化与植物和农作物的关系及其变迁的研究，有6篇文章。崔明昆的《云南新平“花腰傣”植物命名、分类与

环境变迁研究》是以民族生态学为角度的论文。通过考察新平县傣族对植物的命名和分类,进而了解“当地人”的文化和环境的变迁是这篇论文的独到之处。这样的研究目前并不多见,因为它需要兼具人类学和植物学的专业知识。李尚雨的《云南省红河州集市药材市场民族植物学初步研究》研究的是中药材市场,作者的学术背景是民族植物学,他的方法是对一个典型农贸市场所出售的植物药材进行跟踪调查统计,根据其种类和数量的变化分析植物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变迁。邹辉的《哈尼族棕榈种植的传统知识与变迁》、杜薇的《火麻的种植与苗族文化》、何蕊丹的《陆稻、小红米、水酒——佤族传统农作物取舍的文化透视》,均以一种或两种人工栽培植物或农作物为研究对象。精心选择作为一个族群象征性的植物或农作物,透过其“物”的表象,解读其所承载或蕴涵的文化,同时达到表现人与植物或农作物关系变迁的目的,这样的研究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论文对于植物或农作物的象征仪式的研究,反映了三位作者所具有的良好的人类学训练。李建钦的《马苦寨哈尼族草果种植与生态文化变迁影响研究》一文,同样是通过特殊植物即经济作物的种植反映人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和变迁的主题,但它的侧重点不在文化,而是欲反映当代市场经济对于土著族群及其生态环境的巨大影响。

第三部分是关于传统农业和土地利用变迁的研究,计有8篇文章。分布于云南西南部山地的瑶族、布朗族、景颇族、哈尼族、克木人、基诺族等,40多年前还都是从事“刀耕火种”农业的民族。由于历史、文化、生态环境和土地拥有的状况不尽相同,所以各民族的“刀耕火种”方式及其变迁也有很大的差异。杨雪吟的《适应的变迁——勐海布朗山土地管理的生态环境史研究》、黄贵权的《蓝靛瑶的游居与地权的变迁——云南省广南县坡来村、那洪村的研究》、石锐的《景颇族刀耕火种文化的变迁》、王正华的《澜沧拉祜西山农业与生态环境变迁》、曾益群的《勐宋生态环境变迁

简史》、杨晓冰的《环境变迁与生计方式的调适——曼暖远克木人的刀耕火种文化》、街顺宝的《肥料与传统农业的变迁——红河石屏段江北半坡地带考察》，分别论述了7个山地民族的传统的土地制度、“刀耕火种”适应方式及其50多年间的变迁。较长时间的定点田野调查，加之各位作者同中有异的观察和写作方式，使文章显得翔实而多彩。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街顺宝、黄贵权、石锐、王正华4位作者，本身便是少数民族学者，他们返回故里，对生己养己的村寨进行研究，自有其特殊的感悟和厚重。张佩芳、韦锐、张海超的《云南热带季风区山地流域土地利用/土地覆盖变化与人地关系互动研究——以西双版纳基诺族为例》一文，是本书中的“另类”文章。该文主要采用自然科学的遥感信息系统和全球卫星定位系统技术对基诺山35年土地利用和森林植被变化时空动态进行研究。该研究所展示的跨时空的遥感影视图及其精确的图表分析所反映的土地利用和植被的变化，与人类学的调查研究相结合，可以达到完整解释变迁及因果的目的。两种学科的交叉研究，应是生态环境史研究最值得期待的方法之一。

第四部分有两篇文章，一篇是高志英、赵沛曦的《20世纪独龙江交通发展与独龙族社会文化变迁》，另一篇是朱力平的《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疟疾流行史》。独龙江河谷是中国交通最为困难、环境最为闭塞的地区之一。该区生态环境对于生存于河谷中的独龙族的社会文化的影响和制约，表现得尤为突出。从交通的角度研究独龙族社会文化的变迁，无疑是生态环境史的一个很独特和典型的课题。朱力平的疟疾流行史研究同样是生态环境史不可忽视的课题。云南自古为“瘴疠之区”，疟疾即为“瘴疠”中的主要疾病。历史上，疟疾一直是严重危害各族人民健康的“元凶”，其对各民族社会文化的影响也十分显著。作为生态环境史研究的重要领域，朱力平对疟疾的史学的梳理和跨学科的研究无疑具有多方面的学术价值。

从上文对18篇论文的简要评介可知，历时三年多的云南生态

环境史研究课题，已经有了重要的收获。本课题二十几位成员，大部分按照人类学的方法，分别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村寨进行定点调查研究。调查点分布于整个滇西南地带，涉及十余个民族。调查成果既反映了此前 50 多年间上述每个民族的文化和生态环境的变迁，亦反映了 50 多年间整个滇西南地带的文化和生态环境的变迁，初步达到了课题“建构云南西南部热带季风区生态环境史”的目的。

中国生态环境史的研究，尚属一个新的领域，而人类学角度的生态环境史的研究，基本上还处在探索阶段。云南生态环境史研究课题，可以说是开拓性的作业。由于课题成员几乎都是云南本土学者，有的就是少数民族，在田野调查中语言和适应的障碍较少，而且调查时间都比较长，所以论文资料一般都比较丰富。

本课题为中国与日本合作研究项目，三年期间，日方的“日本和东南亚研究小组”曾五次到云南与我方开展交流，我方部分成员亦两次出国参加日方组织的研讨会。国际学术视野的交流与合作，使课题在具体的选题、理论方法的运用等方面，均体现了本学科当前研究的动向和趋势。

当然，本课题作为一项开创性的研究，不足之处也是在所难免的。具体说来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课题成员大部分是人类学和民族学学者，生态学的知识准备相对不足，一些论文也就缺乏生态分析的深度；其次，大部作者并没有历史学的训练，而且受田野资料的局限，有的文章横向分析有余，纵向梳理不足，如果从“史”的角度审视，那显然是有差距的；此外，在十几位作者之中，既有资历不浅的教授，也有初出茅庐的研究生，文章的水平自然不可能在同一个层面上。这些不足和差距，相信会在今后的研究中逐步得以弥补和消除。可喜的是，通过本课题的组织和实践，一批年轻的学者得到了很好的锻炼，按此势头发展下去，必将开辟出人类学生态环境史研究的新局面。

Foreword

I first met Professor Yin Shaoting when he visited National Museum of Ethnology, Osaka as a visiting scholar in early 1980s when I was working as a research fellow to the Museum. Since then, we had several opportunities to meet and discuss about environmental issues in ecological anthropological discourse. Also, we had several chances to visit together to Xishuangbanna for the fieldwork. Yet, these were short and temporary. Finally, we were able to commence a new project jointly, based on the academic agreement between Yunnan University and Research Institute for Humanity and Nature (RIHN) for a three - years - long research, entitled as “a trans - disciplinary study of regional eco - history in tropical monsoon Asia; 1945—2005” funded by RIHN.

I am very much pleased with this as we will be able to cooperate furthermore in details and for a longer period than before. In this regard, I am deeply appreciating understanding and cooperation of Professor Yin to the project. It may surely enhance mutual academic competence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By this moment, we had academic workshops in Kunming twice in 2003 and 2004. Over thirty Chinese scholars have participated to the workshops and they have contributed a great deal, based on their intensive fieldworks in various parts of Yunnan province during the last few years. I am also expressing my sincere gratitude to them and their efforts.

Eco - history project is now achieving unique and successful academic outcomes. Particularly, studies on ecological history in Yunnan bear academic significances as these works are of prime importance in ecological inquiries in Yunnan province under rapidly changing environmental and socio - economic conditions. This book is a compilation of original articles, prepared by some of our Chinese colleagues who are affiliated to the eco - history project, and their contributions deserve to high praises.

Yet, this is not the final process, but a path to the advanced goal has just been cleared by young pioneer scholars. We sincerely wish that scholars in both China and Japan may learn a lot from this book and proceed to their own ways to the eco - historical works in China and elsewhere.

May 23rd, 2005

Tomoya AKIMICHI (秋道智弥)

Professor, (教授)

Research Institute for Humanity and Nature

(日本综合地球环境学研究所)

目 录

人类学生态环境史研究初探(代序)	尹绍亭(1)
Foreword	[日]秋道智弥(11)

西双版纳傣族水文化的变迁与可持续发展

——景洪市勐罕镇曼远村案例研究	郭家骥(1)
-----------------------	----------

大坝与社区:环境变迁中的资源利用与管理

——澜沧江流域漫湾镇慢旧村的调查研究	郑 寒(38)
--------------------------	-----------

云南新平“花腰傣”植物命名、分类与环境的

变迁研究	崔明昆(72)
------------	-----------

云南省红河州集市药材市场民族植物学初步

研究	李尚雨(97)
----------	-----------

哈尼族棕榈种植的传统知识与变迁 邹 辉(110) |

火麻的种植与苗族文化 杜 薇(135) |

陆稻、小红米、水酒

——佤族传统农作物取舍的文化透视	何蕊丹(159)
------------------------	------------

马苔寨哈尼族草果种植与生态文化变迁影响

研究	李建钦(197)
----------	------------

适应的变迁

——勐海布朗山土地管理的生态环境史研究	杨雪吟(227)
---------------------------	------------

蓝靛瑶的游居与地权的变迁

——云南省广南县坡来村、那洪村的研究	黄贵权(260)
--------------------------	------------